

2014 · 第 4 卷

日本侵华史研究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History Research



南京出版社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History Research

日本侵华史研究

(原《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学术顾问

汤重南 张 健 刘江永 张伯兴 张宪文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朱成山

副主任 邵建国 翟 新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卫星 王伟民 孙宅巍 艾德林 朱成山 朱同芳

张 生 张连红 孟国祥 陈俊峰 邵建国 经盛鸿 侯曙光

徐康英 程永明 曾向东 翟 新

主编 朱成山 执行主编 曾向东

中国日本史学会日本侵华史专业委员会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4.第4卷 / 朱成山主编. —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4.12
ISBN978-7-5533-0771-8

I. ①日… II. ①朱… III. 日本-侵华-历史-研
究IV. ①K265.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9476号

书名: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4·第4卷

主编: 朱成山 执行主编: 曾向东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太平门街53号 邮编: 210016

网址: <http://www.njpbs.com> <http://www.njpbs.net>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 ppepalm@126.com

责任编辑: 朱天乐 装帧设计: 肖千浩 外文翻译: 【英】王晓阳 【日】芦鹏 【韩】金海燕

印刷: 南京碧峰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张: 8.75 字数: 190千

版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978-7-5533-0771-8

印数: 2000册

定价: 20.00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特稿

- 围绕南京大屠杀真实历史的近八十年斗争…………… 经盛鸿(1)
- 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的治安管理状况…………… 薛媛元(13)

学术探讨

- 日本对中国书报出版业的摧残…………… 孟国祥(19)
- 从征兵制到甲午战争
- 媒体视野下的近代日本民众国家意识的变迁…………… 田雪梅(26)
- 南京日侨集中营管理所机关报研究…………… 孙继强(39)
- 北满“民生团”事件…………… 于文生(48)
- 关东神宫与日本精神文化侵略…………… 周爱民(56)
-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卫生殖民机构略考…………… 巩瑞波(61)

学术争鸣

- 中国战区受降地究竟在何处
- 芷江洽降与受降之辨析…………… 戚厚杰 卢彦名(6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4.第4卷 / 朱成山主编. —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4.12
ISBN978-7-5533-0771-8

I. ①日… II. ①朱… III. 日本-侵华-历史-研
究IV. ①K265.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9476号

书名: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4·第4卷
主编: 朱成山 执行主编: 曾向东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太平门街53号 邮编: 210016

网址: <http://www.njpbs.com> <http://www.njpbs.net>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 ppepalm@126.com

责任编辑: 朱天乐 装帧设计: 肖千浩 外文翻译: 【英】王晓阳 【日】芦鹏 【韩】金海燕

印刷: 南京碧峰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张: 8.75 字数: 190千

版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978-7-5533-0771-8

印数: 2000册

定价: 20.00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特稿

- 围绕南京大屠杀真实历史的近八十年斗争…………… 经盛鸿(1)
- 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的治安管理状况…………… 薛媛元(13)

学术探讨

- 日本对中国书报出版业的摧残…………… 孟国祥(19)
- 从征兵制到甲午战争
- 媒体视野下的近代日本民众国家意识的变迁…………… 田雪梅(26)
- 南京日侨集中营管理所机关报研究…………… 孙继强(39)
- 北满“民生团”事件…………… 于文生(48)
- 关东神宫与日本精神文化侵略…………… 周爱民(56)
-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卫生殖民机构略考…………… 巩瑞波(61)

学术争鸣

- 中国战区受降地究竟在何处
- 芷江洽降与受降之辨析…………… 戚厚杰 卢彦名(69)

相关史研究

- 略论伪满统治对东北农民的掠夺 高晓燕 (78)
- 伪满洲国始作俑者
——第九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评析 沈 燕 (84)
- 南京大屠杀的前页历史——旅顺大屠杀 王珍仁 (92)

口述史研究

- 我所经历的南京大屠杀和八年沦陷 范晋德 口述 (100)

域外研究

- 寻访西班牙杜兰戈、格尔尼卡、巴塞罗那大轰炸遗址 【日】笠原十九司 文 芦鹏 译 (108)

历史人物

- 一个中央军校老教官的抗战培训生涯 沈丽国 (115)

学术文摘

-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实施“一体化规划”的实质是掠夺和奴化 赵建民 (126)

书 评

新闻纸里的南京大屠杀

- 评《〈东南日报〉南京大屠杀报道研究》 胡佳诗 (129)
- 《日本侵华史研究》2014年总目录 (131)

日本侵华史研究

(原《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2014·第4卷

总No24

目 录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History Research

Main Contents

2014 No.4

-
- Nearly Eight Years Struggle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about the True History ... Jing Shenghong (1)
- Law and Order Situatio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Zone dur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Xue Yuanyuan (13)
-
- Japan's Devastation of China's Publishing Industry Meng Guoxiang (19)
- From Conscription to the Sino-Japanese War
—Changes in Modern Japanes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National Media Perspective Tian Xuemei (26)
- Study of Newspaper of Japanese Orphans Camps in Nanjing Sun Jiqiang (39)
- Minsheng Group Event in North Manchuria Yu Wensheng (48)
- Kanto Shrine and Japanese Spiritual Culture of Aggression Zhou Aimin (56)
- Research in Japan invading Northeast China's Health Colonial Institutions Gong Ruibo (61)
-
- Where did the Japanese Surrender in China Theatre?
—An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liminary Surrender at
Zhijiang and the Formal Surrender..... Qi Houjie Lu Yanming (69)
-
- Research in Plunder of Northeast Farmers of Domination of Manchukuo Gao Xiaoyan (78)
- The initiator of the Puppet Manchukuo
—Comment on the 9th Kwantung Army Commander Honjo Shigeru Shen Yan (84)
- Previous History of the Nanjing Massacre—Port Arthur Massacre Wang ZhenRen (92)
-
- I Have experienced Nanjing Massacre and the Fall for eight years Fan Jinde (100)
-
- Visiting Big Bombing Sites of Durango, Guernica,
Barcelona in Spain Tokushi Kasahara translated by Lu Peng (108)
-
- The Anti-Japanese Training Career of an Old instructor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Academy..... Shen Liguao (115)
-
- The Essence Japan Implying Integrated Planning to Taiwan is Looting
and Enslav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Zhao Jianmin (126)
-
- Nanjing Massacre in Newsprint
—Comment on Nanjing Massacre reported research in Daily Northwestern Hu Jiashi (129)

日本侵華史研究

2014 No.4

目次

南京大虐殺の真実な歴史に関わる八十年間の戦い	経盛鴻 (1)
南京大虐殺の間における国際安全区の治安状況について	薛媛元 (13)
中国の書籍新聞出版業が日本に破壊される状況について	孟国祥 (19)
徴兵制から甲午戦争 ——マスメディアが見る近代日本民衆の国家意識の変遷	田雪梅 (26)
南京の日僑収容所管理所の機関誌研究	孫継強 (39)
北満「民生団」事件	于文生 (48)
関東神宮と日本の精神文化侵略	周愛民 (56)
中国東北地方における日本侵略軍の衛生植民機構について	鞏瑞波 (61)
中国戦区の日本軍降伏地の場所について ——芷江降伏交渉と降伏地の区別	戚厚傑 盧彦名 (69)
偽満州国の統治と東北農民への略奪	高曉燕 (78)
偽満州国を作った張本人——第九任関東軍司令官本庄繁について	潘燕 (84)
南京大虐殺の前史——旅順大虐殺	王珍仁 (92)
私が経験した南京大虐殺と八年間の陥落	範晋徳 (口述) (100)
ドゥランゴ、ゲルニカ、バルセロナを訪ねて 「日本」 訳笠原十九司 文 芦鵬 訳	(108)
抗戦におけるある中央軍校ベテラン教官養成職務の生涯	潘麗国 (115)
日本占領時期における台湾「一体化計画」の 実質は略奪と奴隷化である	趙建民 (126)
新聞紙の中の南京大虐殺 ——『「東南日報」南京大虐殺報道についての研究』を論ずる	胡佳詩 (129)

남경대학살을 둘러싼 진실된 역사의 80년간의 투쟁	경성홍 (1)
남경대학살기간 국제 안전구역의 치안관리 상황	설원원 (13)
일본이 중국 출판업계에 끼친 피해	맹국상 (19)
증병제로부터 갑오전쟁까지	
——대중매체 각도에서 본 근대 일본국민의 국가의식의 변화	전설매 (26)
남경 일본인 수용소 관리기관 잡지연구	손계강 (39)
만주북부“민생단”사건	어문상 (48)
관동 신궁(神宮) 및 일본 정신문화 침략	주애민 (56)
일본이 중국 동북의 위생 식민기구에 대한 침략 연구	공서피 (61)
중국 전쟁구역에서 투항수락지는 어디인가	
——지강(芷江)협상투항 및 투항수락 구별	척후걸 노연명 (69)
위만통치가 동북농민에 대한 약탈 논술 위만주국 시작용자	
——제9임 관동군 사령관 혼조 시게루 분석	고소연 (78)
남경대학살의 사전역사——뤼순대학살	심 연 (84)
내가 겪은 남경대학살과 8년의 함락	왕진인 (92)
스페인 듀랑고,게르니카,바르셀로나 대폭격 유지 방문	범진덕 구술 (100)
중앙 군사학교 교관의 항일전쟁 육성 생애	【일】가사하라 도쿠시 글 노봉 번역 (108)
일제시기 일본이 대만에서 실시한 “일체화 계획”은	심려국 (115)
실질상 약탈과 노예화 이다	조건민 (126)
신문지중의 남경대학살——《<동남일보>남경대학살 보도연구》평론	호가시 (129)

围绕南京大屠杀真实历史的近八十年斗争

经盛鸿

摘要: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日本侵华史,是从战时日本当局到战后的日本右翼学者与政客,一以贯之的政治宣传和喧嚣,背后隐藏着他们险恶的政治用心和蛊惑人心、颠倒是非的目的。中国人民与世界上主持正义的人士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与人类的正义,与他们进行了近80年的斗争。世界正义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2014年2月2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是在国家层面,以最庄严隆重的形式,确认了这段历史,追忆死难者,缅怀英烈,警醒生者,警钟长鸣,回击日本右派,诉求和平。这是中华民族集体意志的体现!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否认。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包括日本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日本一些右翼学者与政客一再推翻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和日本战犯判决的言论与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与世界和平之船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日本右翼学者与政客;否定;维护

作者简介:经盛鸿,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南京,210097

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日本侵华史,是从战时日本当局到战后的日本右翼学者与政客,一以贯之的政治宣传和喧嚣,其背后隐藏着他们险恶的政治用心。中国人民与世界上主持正义的人士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与人类的正义,与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迄今为止,已近80年。

一、战时日本当局对南京大屠杀的封锁、掩盖与粉饰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后,立即对手无寸铁的民众与放下武器的战俘进行疯狂的血腥屠杀,伴之以抢劫、强奸、焚烧。日军的恐怖暴行延续了六周,杀害中国军民达30万人。南京成了一座人间的“活地狱”。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中最具代表性与典型性的暴行之一,是世界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日军在开始有计划地血腥大屠杀时,则开始了有计划地对南京严密的新闻封锁。他们首先将南京城内的中国新闻传媒机构扫荡一空,同时切断了南

京与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严禁一切中外人员,包括外国新闻记者进出南京。因此,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南京成了全世界新闻视野以外的一个被隔绝的城市。全世界的新闻传媒,包括西方的与中国的,都得不到关于南京的任何一点真实信息,对当时正在南京发生的日军大屠杀的情况,不能做一点报道。

在这时,日军当局只允许日本随军记者采访与报道有关南京沦陷后的情况。日本随军记者中的大多数人,因长期受到日本当局的思想灌输,早就丧失了人类起码的良知,具备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切思想特征与行为特征,是日本当局侵华与屠杀恐怖政策的热烈拥护者与宣传鼓动者。当日军占领南京实施大屠杀时,他们自觉地充当了恶魔的辩护士与粉饰工,精心制造与发布各种捏造的“南京获得新生”、“南京一片祥和”、“南京人民喜迎解放、感激皇军恩德”的电讯、特稿与新闻照片。全世界所能得到的,只能是经过日本当局严格审查、由日本记者发出的这类掩盖与粉饰日军大屠杀暴行的消息。

例如,1937年12月14日,即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二天,《东京朝日新闻》以《妇女从公用防空洞里爬出来》为题,刊登了该社特派记者角野拍摄的大幅照片。照片内容是,日军官兵引导中国姑娘和抱着小孩的太太,陆续从公用防空洞里爬出来,恢复正常生活,表现了南京妇女获得皇军“解放”后欣喜与感激的心情——这是日本报刊第一次刊登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的专题照片和报道,以后越来越多,甚至连篇累牍。

1937年12月22日,《东京朝日新闻》用了半个版面,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标题为《对昨日之温情——南京城内的亲善情景》。照片共五幅,是该社特派记者河村于12月20日在南京拍摄的。第二幅照片题为《皇军官兵之情——满足食欲的投降兵》,内容是两个日本兵拖着竹篓,向俘虏们分发大米饭。第三幅照片题为《炮声停止后南京城内的亲善情景》,内容是正在和中国摊贩打趣的日本兵,一幅与战前没有什么区别的热闹的南京街头景象。

1938年1月8日,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创办的中文《新申报》刊登一则从南京发出的新闻通讯,题为《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宣称:“南京市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阳光照耀着城市西北角的难民区。从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在已经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军入城以前,他们备受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够取得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无以复加。幸而皇军现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1]当时留驻南京的德国侨民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在日记中对这篇报道愤怒地斥责道:“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荒谬绝伦的无耻谎言,其造谣手段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2]

日本随军记者凭空捏造的南京虚假报道却符合日本当局的政策与需要,它可以证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正义性与必要性,可以掩盖、抵赖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凶残、丑恶与罪孽深重,可以进一步欺骗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因而这些报道备受青睐,在日本各大小报刊上大登特登,几乎控制了

报纸的全部版面。这些虚假报道产生了一定作用,特别是使得广大日本民众一直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惊天血案一无所知,一直蒙在鼓里。

但是,不管日方当局如何封锁,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消息,还是通过不同途径传播了出去。首先是5位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进行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德丁、司迪尔等人,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无数战争暴行,在设法离开南京后,迅速发出电讯报道,分别在《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美联社、路透社等媒体上进行了揭露。随即英国《每日电讯》、苏联《真理报》等也相继作了报道。西方记者在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时,深刻地揭示,这不是日本少数官兵偶然的失控行为,而是日本当局推行武力征服与屠杀威慑,对中国军民“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他们甚至正确地预见到日本在未来发动的侵略战争中,也将以同样的残暴血腥手段对付其他国家人民,为世界各国敲响了预防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警钟,写道:“日军如果侵略任何国家,显然也将采取同样手段,对于这一点,似乎也找不出可以怀疑的理由。”^[3]后来的历史发展不幸被他们言中了,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在菲律宾、新加坡等等,都进行了大屠杀。

在国外新闻媒体揭露日军暴行的同时,中国国内的《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也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大量的揭露和报道,仅中共《新华日报》自1938年1月至5月间,报道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新闻就有10余篇。

接着,当时留驻南京的一些西方侨民,把他们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详细而真实地记录下来,用书信、日记等方式向世界揭露。1938年3月,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把这些资料汇编成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在许多国家出版发行。此书的中译文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于1938年7月由汉口民国出版社出版发行,郭沫若为此书写了序言。他说:“这样公平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这儿不仅横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4]

留在南京、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

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John G Magee),用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冒着生命危险,极其秘密地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的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秘书长乔治·费奇(George A Fitch)把马吉牧师的胶片从南京秘密带到上海,并在那里制作了四部拷贝:一部送给德国外交官罗森,一部送给英国传教士,一部带回美国,一部留在中国。它向世界揭露了日军暴行。这部影片1991年在美国被重新发现,成为留存至今的当年现场拍摄南京大屠杀的动态画面。

不久,南京难民中有一些九死一生逃出血城的大屠杀幸存者,以自己的血泪,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用日记、纪实等形式,向国内外控诉了日军的暴行,如郭歧的《陷都血泪录》、蒋公毅的《陷京三月记》、李克痕的《沦京五月记》、范式之的《敌蹂躏下的南京》等等,在中外各地出版、发表、流传。在这同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刘易斯·史迈士(Lewis S. C. Smythe)及其助手根据调查资料编写成《南京战祸写真》。1938年1月初先后回到南京的一些西方国家外交使节也向各国政府报告了南京的情况。

当时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也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于1938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深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痛苦极矣。”1938年3月5日,《大公报》刊登中央社电讯《京中气象凄惨》,蒋介石阅后,在日记中愤慨地写道:“敌军残杀我南京附近之壮丁殆尽,痛极。”后来,蒋介石看到日军自行拍摄的记录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照片,受到极大的震撼,痛苦悲愤达于极点,他在1938年5月12日日记中写道:“雪耻。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惨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在1938年5月13日日记中写道:“雪耻。敌寇残暴凶横,实古今无例,若不消灭,何以维持人道!”在1938年7月19日日记中写道:“见寇军残杀我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愤乃至瞑眩,极忧东方民族之仇讎相报,不知何日能了也。”^[5]

1938年年初,蒋介石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先后几次下达“搜集日本侵华战争兽行出版中西文本宣传资料”的手谕,要求“将日军官兵灭绝人道之兽行宣告于世”,广为宣传,进一步激发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奋勇杀敌,为遇难同胞报仇雪耻;同时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赢得世界人民与各国政府对中国抗战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处为此进行了多项工作,其中,在1938年3月间,秘密组织、派遣四位国际友人,赴日本东京等地,用各种宣传形式,向在东京的日本各界人士与其他各国人士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真相。国际宣传处香港办事处组织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根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等各种的资料,先后编写出三本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英文论著,这就是:《日本人的战争行为》(The War Conduct of Japanese)、《日本人战争行为要论》(A Digest of Japanese War Conduct)与《南京安全区档案》(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 Limited),其中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占有很大的篇幅与重要的地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是国民政府中进行抗战宣传的又一重要机构,在1938年7月编辑出版了《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收录了100多幅日军侵华暴行的图片,并配文字说明,其中有10多幅反映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照片,有日军战机轰炸南京留下的废墟;有日军杀害南京民众,连5岁小孩也不放过;有日军强奸、轮奸南京妇女,甚至惨无人道地强奸11岁的女孩,等。该书的文字说明写道:“寇军占领南京后烧杀奸掳,无所不为,把那动人怀想、发人诗思的历史上名城,变成了一座人间的地狱。”^[6]

中共中央当时设在延安,条件艰苦,掌握的报刊不多,但对日军在中国各地广泛实施的烧杀淫掠等战争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与强烈的谴责。193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五日刊)发表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尸山血海的南京——敌在南京之空前暴行》,因文长未能刊完,在下一期,即1938年3月1日出版的《新中华报》上刊出此文的后半部分。此文章分段写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有“凶残屠杀”、“纵火狂

烧”、“奸淫妇女”、“掳掠一空”等,以及“粮食恐慌”、“伪会丑态”、“敌军布防”、“市面情形”等南京现状情形。^[7]1939年9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的“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简称《日本在沦陷区》,作为“时事问题丛书”第二集,比较全面汇编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战争暴行与经济掠夺等方面材料。该书第三编为“日寇在沦陷区的暴行”,分东北、华北、华中、广州等地域,其中第三章是“日寇在华中的暴行”,第一节“在南京”,就是专门记述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及在南京贩卖毒品等的材料。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此书写序,题为《研究沦陷区》,指出研究南京等沦陷区,了解“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从而认识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与极端野蛮性,认识日本侵略者的“失道寡助”。^[8]

中、外不同党派、不同职业、不同人士写下的这些大量的报道、日记、书信、报告、著作等,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真相,引起了全世界正义舆论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强烈谴责,也揭穿了日本新闻报道的谎言,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千方百计封锁、掩盖和粉饰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失败。

到1943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军民与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军民强有力的打击下,走上了日暮途穷的道路。为了挽回颓势,日本东条内阁被迫抛出了所谓“对华新政策”,实施种种对中国人民“示好”的政策与措施。而为当年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进行掩饰与辩护,力图抹去或淡化中国人民心中的疼痛与仇恨,就成为日本侵华当局一项最重要的工作。

1943年10月5日,日本“兴亚院”顾问小幡八郎特地来到南京,在驻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兼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畑俊六大将的陪同下,来到位于南京高楼门附近的伪考试院院长江亢虎的私宅,拜访这位擅长舞文弄墨的文人政客江亢虎。小幡八郎在谈话中希望江亢虎站在所谓“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谈一谈1937年12月日军攻入南京后的“事件”,实际上就是要江亢虎公开为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辩护与开脱,江亢虎出于某种考虑,开始很是

犹豫,表示要考虑考虑。日方当局在第二天就派人给江亢虎送来了10根金条和大量伪“中储券”,同时送上一叠所谓“南京事件”的真相资料。江亢虎这个汉奸再次出卖国格与人格,从当年10月中旬起,先后写出《“南京惨案”之我见》等一系列文章,陆续在汪伪政府的报刊与日本的报刊上发表,无耻地为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作辩护与开脱。

江亢虎无耻地为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作辩护与开脱的文章,立即激起了正艰苦地进行抗战的中国广大军民的无比愤慨与共同声讨。

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史会的工作人员孙俚工广泛地从中、外各报刊上搜集了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各类文章,编辑成一本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文集《沦陷区惨状记》,于1943年在重庆出版。在这本文集中,有多篇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文章,如《惨杀幼孩》、英国记者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英文《密勒士评论报》刊登的揭露日军杀人比赛的《南京紫金山下》、英文《字林西报》抨击南京大屠杀的社论、英文《大美晚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南村的《呜咽秦淮水不流》、慎武君的《沦陷后之南京》、《新新新闻》刊登的《敌在京兽行》、美国《视野》刊登的《南京的大悲剧》、林娜的《血泪话金陵》、李克痕的《沦陷后之南京》、祝成的《铁蹄下的南京》、沙溯英的《如此江南》,以及《南京居民之生活》、《今日之南京》、《德国人某君关于日军在南京奸淫妇女的暴行给友人的信》等,或收录全文,或摘录部分,均以无可辩驳的详尽、真实的事实,以无数南京死难同胞的鲜血与许许多多南京难民的血泪,再次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在中国人民与全世界人民面前,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与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汉奸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二、日本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南京大屠杀的无耻狡辩

南京光复后不久,中国政府与民众就开展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调查。1945年11月7日,南京十四个机关、团体的代表,举行会议,议决成立“南京调查敌人罪行委员会”,经三个多月的调查,到1946年2月,共获得500余份资料,其内容涉及

日军在南京的29支部队屠杀、伤害、奸淫、劫夺、破坏、强制服役等罪行,达295 882种。1945年12月10日,南京市政府又成立了“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该会也以南京大屠杀案为调查重点。1946年6月23日,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召开“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成立及第一次会议,临时参议会议长陈裕光、副议长陈耀东分任正、副主任委员,并指示在南京市13个区成立“调查小组委员会”,由各区区长具体负责,登报向广大民众广泛征集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证件。该委员会从1946年6月底开始,至10月5日基本结束,除对过去已形成的一些调查史料进行复查外,重点对沦陷时期滞留南京的市民进行个案调查,计有确实人证的案件2 784件。该委员会从大量受害者案例中,选出十个典型个案,如柏鸿恩、李秀英、殷有余等,都是遭受日军大屠杀伤害最为严重的幸存者。另外,该委员会还搜集到由市民罗瑾、吴连凯冒着生命危险密藏的十六幅日军自行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被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列为“京字第一号证据”。

1945年12月6日,中、美、英、苏四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特别通告,命令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便“审理犯有破坏和平罪及包括破坏和平罪在内的个人、团体成员以及兼有此双重资格而被起诉者。”同时,盟军最高统帅批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与检察官由中、美、英、苏、澳、印、荷、菲等盟国所派遣人员组成。

1946年2月7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与助理检察官裘绍恒受中国政府委派,来到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起诉与审判。他们立即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战犯名单,其中就有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谷寿夫等人。1946年3月20日,中国法官梅汝璈受中国政府委派,从上海飞抵东京,就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

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历时多

年,罪行累累,战犯人数众多。盟国议定,将所有日本战犯按罪行轻重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级,将甲级战犯交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将乙、丙级战犯交由罪行发生所在国家的军事法庭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各国检察官的通力合作,在1946年4月28日全部完成起诉书的撰写工作,确定28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告,其中有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指挥进攻南京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参与指挥进攻南京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参与进攻南京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华中方面军”第十军野战重炮兵第六旅团第十三联队联队长桥本欣五郎等。

1946年4月29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Joseph B Keenan)正式向法庭递交了起诉书,对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二十八名日本甲级战犯提起公诉,诉讼理由包括三类55项:第一类“破坏和平罪”,罪状第1—36项;第二类“杀人罪”,罪状第37—52项;第三类“破坏战争犯罪及违反人道罪”,罪状第53—55项。1946年5月3日上午8时42分,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共28人正式开庭审理。5月3、4日,由检察方面朗读起诉书;从6月3日开始,到1947年1月24日,由检察方面提出证据和陈述。日本战犯的丧钟开始敲响!

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采用英美法系,允许控、辩双方当庭辩驳,对证据的要求特别严格。日方组成了112人之众的“律师辩护团”为日本战犯进行辩护。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大、最血腥野蛮的战争暴行,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其审判格外重视。为查清南京大屠杀事实真相,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门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季南为了获得足够的有力证据,在审讯前期,于1946年5月30日下令,派遣美国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David Nelson Sutton)、中国检察官助理裘劭恒等人,专程前来南京,为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实地取证。1946年6月4日,萨顿

一行到达南京。他们得到了中国政府与南京民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萨顿一行在南京,会见了中国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等有关官员,找到了多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及中外目击者。萨顿一行在南京获得了大量的人证与物证。1946年6月8日,他们带着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代表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以及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代表、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秘书长乔治·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会长许传音等人,于6月12日飞回东京。不久,南京鼓楼医院的美籍医生威尔逊、南京德胜教堂美籍牧师马吉也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应召前往东京。

1946年7月下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由检察方面提出与宣读了多项书面证据。南京的受害居民、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与战时驻南京的西方侨民的代表以证人的身份到法庭上作证。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调查与审讯期间,还依法对日方证人多田骏、桥本欣五郎、伊藤信文等进行了调查与质证,听取了被告松井石根、武藤章的证词与回答质证,以及被告证人中村三夫、饭沼守、冈田尚、日高信六郎等的证词与回答质证。

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审判的同时,中国国民政府依据盟国发布的一系列宣言、决定、通告的精神,在南京等地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展对日本乙、丙级战犯的调查与审判工作。无疑,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中,以对指挥南京大屠杀案的乙级罪犯、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和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野田毅、向井敏明以及田中军吉这三名丙级战犯的审理,最为引人注目,也最为重要。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依法判决谷寿夫等罪犯死刑。^[9]

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相比,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则历时更长。审判一开始,松井石根宣读了十二条宣誓证词,然后对自己的罪行进行无耻的诡辩。他竟把日本的侵华战争说成是“兄弟之争”,是“哥哥教训不听话

的弟弟”,是“爱的战争”等。他说:“我总是坚信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是所谓‘亚洲家庭’兄弟间的争吵。对日本来说通过武力来营救日本侨民,保护我们受到威胁的权力和利益是不可避免的经历。这就像是兄长在长时间忍耐后,痛打其年轻而又桀骜不驯的弟弟一样。这一行动使中国恢复理智,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出于爱。”对于日军南京大屠杀,他则声称:“尽管我在南京之战中小心谨慎,但在当时忙乱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些冲动的官兵干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暴行。事后,对于听说的士兵的不良行为我感到非常遗憾和难过。攻占南京时,我正卧病在140英里外的苏州,根本不知道士兵违背我的命令所犯下的这些暴行,也没听到任何有关的报告。12月17日,入南京城后,我才第一次从宪兵司令那里听到此事。于是我立刻下令各个部门严查此事并对罪犯严惩不贷。”他攻击法庭检察官对他的起诉与证人对他的控诉,说:“在南京战役中,有大量的中国老百姓和士兵遭到炮击和子弹的袭击而身亡或受伤,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但我对于起诉方文件中所说的‘南京之战中的有计划的屠杀’之说不敢苟同。很显然,文件中所说的‘关于日军下令,并放任屠杀的行为’只能是诽谤。至于当时的情况,不用说,作为华中方面军的司令我是尽心履行我的职责的,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防止不幸事件的发生,并严惩罪行、赔偿损失。”^[10]

松井石根的这些诡辩与推脱,遭到了中国检察官和许多证人严正的批驳。日军对南京军民烧杀淫掠四十多天,惨绝人寰,世界上有这样的“兄弟”和“爱”吗?来自加拿大、负责对松井石根质证的副检察官诺兰准将,以松井石根所承认的事实,即松井曾于1937年12月底请美国记者阿本德帮助他平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谣言”,有力地反驳松井所称的“不知情”。来自日方的辩护律师有许多人明确知道历史真相,因而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辩护。如辩护律师泷川政次郎,战时在北京就听说了南京大屠杀,并在1938年夏到南京时,特地坐黄包车在市区内兜了一圈,时间已过去半年,南京市内依然随处是被烧毁的民房。黄包车夫告诉他,这都是日本兵烧的。车夫还说,南京市的女人几乎都被日军强

暴过。所以,日方辩护律师们采取的方式是,放弃对日军暴行的辩护,而把重点放在作为方面军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应不应该为部下的行为负责、以及负责到何种程度。日本辩护方提出的物证,是当时由西方侨民设立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写给日军的“感谢信”,内容是感谢日军没有炮击难民区,以及赠送给为难民区运送粮食的日本兵个人的礼物。这几份证据无法推翻检察方提出的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大量证人和证词。

在审判期间,日本的报纸遵照占领军最高司令部(GHQ)的指示,几乎每天都以当时只有四个版面的一半左右,来报道东京审判。绝大多数日本人通过这次审判,才知道了那场以天皇制下面的军阀为中心,财阀、官僚、媒体和右翼势力一起操作的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了南京大屠杀,知道了日本侵略军的残暴。东京审判容许一般人旁听。审判开始后,每周一般有1500名日本人和450名盟国人士参加旁听,而在法庭开始审理南京大屠杀案件时,参加旁听的日本人增加到了2000人以上,这说明了日本人对该事件的关心程度。从日本人的立场来说,他们很希望能够推翻检察方的指控,但事实使很多日本人失望。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两年多时间开庭审问与调查后,于1948年11月4日,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勃宣读了长达1218页的判决书,列数了日本战犯在南京及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犯下的战争罪行,作出了庄严的判决。其中,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判决是:“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纵火行为持续了六个星期,三分之一的南京因此变成废墟……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根据这些团体的报告说,尸体大多数是被反绑着两手的。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抛尸入江,或以其他方式处理的尸体计算在内。”^[1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以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武藤彰以

死刑,于1948年12月22日在东京巢鸭监狱将他们执行绞刑。但松井石根一直不认罪,他在死前写给他妻子的一首诗中,竟恬不知耻地宣称:“平生不做缺德事”。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代表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意愿,平抑了无数的中国死难者与幸存者的冤愤之气,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和权威性。它们从国际法的高度,确认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将日本战犯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经严格的审判所确认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成为历史的铁案。

三、二战后日、中国绕南京大屠杀历史走过的曲折道路

应该指出,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不彻底的,尤其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各项罪行,包括南京大屠杀罪行,没有进行深入的清算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日本右翼势力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保存完整。日本天皇裕仁逍遥法外。日军进攻南京与南京大屠杀的前线最高指挥官朝香宫鸠彦亲王,因为是日本的皇族、天皇裕仁的叔父,也逃脱了审判。在1948年12月2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将尸体火化、将骨灰抛入大海后,日本那家火葬场的负责人飞天美善等人,竟潜入火葬场,将七名罪犯的残余骨灰偷盗出来,送到爱知县,建了一座“殉国七士墓”,让日本右派络绎不绝前来祭祀,称之为“小靖国神社”。一些日本战犯被释放后,如甲级战犯岸信介之流,竟重登政坛,进入内阁,当上了首相等要职。这些都给后来日本右翼势力的重新崛起与翻案活动以可乘之机;再加上战后苏联和西方两个阵营的冷战局面迅速形成等原因,战后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尤其是对法庭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宣判,进行攻击与诽谤。

南京大屠杀的血泪历史在日本被刻意封锁和淡化,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仍是日本新闻出版界的禁忌。

在日本,南京大屠杀被重新提出来,是在1967

年。这年,日本进步人士新岛良友在访问南京后,首次发表了几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之后,早稻田大学洞富雄教授编著了《近代战史之谜》,其中用了很大篇幅介绍南京大屠杀事件。从1971年6月开始,《朝日新闻》著名记者本多胜一访问中国,对遭受日军暴行的地区和幸存者进行了采访,收集了许多档案资料和照片,回国后出版了《中国之旅》,并在《朝日新闻》连载,里面10次提到南京大屠杀,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注意。这部报告文学的单行本,10年内重印了26次,成为长期畅销书。以洞富雄教授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在1984年组成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开始具体调查南京大屠杀事件。洞富雄教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新作《南京事件》和两卷《南京大屠杀资料集》出版。至此,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引起了日本广大国民的重视。

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笠原十九司、井上久士、吉田裕等所代表的学界群体,被人称为“大屠杀派”或“肯定派”。他们尊重历史、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维护日中友好,与右翼分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洞富雄继《近代战史之谜》、《南京大屠杀(决定版)》之后,又推出了《南京大屠杀之证明》等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著作。藤原彰在他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中,则特别强调指出,日军在南京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是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的。他严厉批评了日本右翼人士不把中国死难士兵列入被屠杀人数的做法。本多胜一又撰写了《笔杆子的阴谋》,对日本右翼人士铃木明等人的谬论一一予以批驳。“研究南京大屠杀全国联络会”编写了《南京大屠杀》,笠原十九司撰写了《南京安全区百日》,津田道夫撰写了《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肯定派”的研究成果显著,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学派。以松冈环为代表的日本民间普通人士,则通过对许多日本老兵的调查笔录,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但与“肯定派”相比较,由右翼人士组成的“否定派”,或称“虚构派”、“幻想派”,则在日本的人数和影响更大。他们称,南京大屠杀是史无其事,乃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编造”与中国人民别有用心

的山本七平以及曾担任过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等。早在1971年本多胜一发表《中国之旅》时,日本右翼的《诸君》杂志就对他开展批判。1978年,日本右翼人士更把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的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等人的亡灵,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请进东京的靖国神社,供人朝拜。

在1949年后的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和宣传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虽然早在1938年,中共长江局在武汉创办的《新华日报》,就曾多次报道了南京大屠杀。此后,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等也对南京大屠杀作过报道和揭露,但由于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争夺政权,历经数年的血肉拼杀,在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国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影响,阶级斗争理论与政治挂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和研究产生日益严重的制约。中国学术界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30多年里,对南京大屠杀几乎没有研究,只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高兴祖,在1960年组织该系的部分师生,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调查,历经两年,查阅了相关的档案资料与照片,走访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最后编写成《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约七、八万字,油印成一本小册子。这是建国以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本研究著作,《人民日报》为此作了简短报道。1962年,适逢南京大屠杀25周年之际,高兴祖对初稿进行了审定和增补,但却不能公开出版。196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计划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11月江苏新华印刷厂编排印刷出清样稿,但最后还是停印。这部书稿直到1979年才获得刊印,但只是一本几万字的读本,供内部交流。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对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修建,也不得不考虑到中日关系。认识的模糊和历史的曲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许多在文革前后入学的大学生,在大学数年就读,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重要史事,书上没有,老师也不讲,竟浑然无知。在1949年后出生的许多南京人,也多不知道在他们脚下的土地上,曾流淌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的鲜血!记忆的复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直到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中华民国史辞典》，仍未将“南京大屠杀”收入。

四、1982年后日、中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论

1982年，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宣传，是一个节点。

1982年7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公然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对于南京大屠杀，则说是“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才引起日军的激愤，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文部省还删掉了原教材中“中国牺牲者达20万人之多”，“日军进行强奸、掠夺、放火……遭到了国际上的谴责”等段落，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中国政府就此向日方提出交涉。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牢记这个教训》的评论，对日本教科书事件进行批评。

日本右翼人士乘机兴风作浪，不仅攻击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而且猖狂地攻击和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尤其是对法庭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宣判，围攻日本的左翼人士，否定日本侵华和南京大屠杀史。

日本右翼学者冲在前面，抛出了多种文章与论著，如《南京大屠杀的幻想》、《日本人与犹太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等。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南京刚刚落成开放后不久，田中正明就迅速在《正论》杂志1985年第12期上抛出了《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挑衅性文章。他们胡说，在战时的日本国民只知道南京的民众是欢迎日军的解放，对日军十分友好，而对南京大屠杀却从未听说。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得意地说：“我，为了写此书，专门将《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当时称《东京日日新闻》）、《读卖新闻》三家报纸1937年12月至翌年2月，即发生所谓‘南京大屠杀’那个时期的缩印版复制下来，对当时的新闻报道，进行了详细查阅。……但翻遍这三家报纸的所有版面，却不见有关杀人、强奸的片言只语。”日本右翼评论家村上兵卫说：“在远东军事审判中，所谓的‘南京大屠杀’使日本人大为诧异。直到战争结束，日本人并不知道有过那么回事。”日本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说：“这全怪远东国际审

判。战后的日本可以说是被迫屈从于‘东京审判史观’的。”^[12]1998年12月，日本展转社公开出版了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的《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和《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两书，竟诬蔑李秀英和夏淑琴这两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老人是“伪证人”。

日本的右翼政客出于某种考虑，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很少参加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多年执政的自由民主党政客中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发表否定南京大屠杀言论的，是1994年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结果，他在就任11天之后，就因此言论被迫辞职。担任首相多年的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抗议，坚持多年参拜供奉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2007年6月19日，自民党中约100名国会议员组成的“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委员会”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更声称：基于对当时（日本）官方文件和媒体新闻报道的调查来看，“我们无法确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民主党和维新会中也有许多政客，一直否认南京大屠杀，常常大放厥词。

日本的右翼学者与政客的无耻言论激起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包括日本有识之士的愤怒与抗议。从1982年开始，在中国，尤其在南京，政府和社会各界日益关注和重视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研究和宣传教育。

1983年11月，南京市政府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1984年2月至6月，官方首次有组织、大规模地调查南京大屠杀，发现了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1756人。1985年8月15日，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落成开放。此时距南京大屠杀已近半个世纪。

南京和全国的一批专家、学者抱着神圣的职责，开始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南京大屠杀史。他们首先组织力量，向中国、日本、西方各国的有关单位与人士广泛地征集档案资料、报刊图书资料、现场图片、影片资料等；又查访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重要历史见证人，获得了大量鲜活有力的口述资料。政府有关部门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生活资助与抢救性调查。在广泛征集史料的基础上，专家、学者经